

焦点透视

一线调研

阅读提示

3月30日,主题为“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社区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沙龙在上海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这是新一届上海市妇女学学会和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首次活动,也拉开了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今年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序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家庭现代化、家政服务、上海城郊广场舞以及关于上海工人新村的书写作品等进行了分享。

■ 章羽

3月30日,主题为“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社区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沙龙在上海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这是新一届上海市妇女学学会和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首次活动,也拉开了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今年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次学术沙龙由上海理工大学妇工委副主任杨向宁主持。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孙跃东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介绍了上理工为高校女性成长成才搭建的路径与平台,以及上理工妇女研究中心为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行的理论探索和社区实践。

上海市妇联副主席葛影敏到会讲话,她指出,性别平等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与男性一样,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科技攻关、创新创业、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第一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力量。

中国式家庭现代化与家政服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计迎春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式家庭现代化:双系家庭的兴起和孝道的嬗变》的演讲。计教授在中国社会和中国话语语境下,以复杂现代性为理论内核,阐述了她的“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马赛克家庭主义”是计教授于2017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她认为,中国现代的家庭关系就像马赛克图案一样,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在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共生、杂糅、交错并不断发展。这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马赛克现代性,既是国家家庭制度转型的背景,也是其变化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传统大家庭所重视的代际关系对现代中国家庭依然重要,同时家庭结构、关系和互动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传统父权的削弱、父系母系双系并重,特别是不同代际的女性在照料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推动着这种双系多核、代际亲密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的出现。并且随着孝道的去父权化和去父系化,孝道也呈现双系化模式。在养老实践中,女儿已经成了主力军。如果女性本身还是媳妇的话,同时还要承担着公婆的养老责任。在这种双系多核家庭模式的规范和实践层面,不同代际和双系的女性在养老和育儿照料中分工协作,完成社会再生产最重要的环节和循环,从而抵御了市场的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苏熠慧副教授基于2021年“上海家政服务人员RDS调查”的1000份家政服务人员样本,分析了培训对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家政服务人员获得的培训证书数量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获得的证书数量越多,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越高。而培训时间对工作满意度具有独立正向作用,对提高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单纯增加同类培训的时间,对提高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意义不大。语言技能的获得对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语言技能也可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家政服务人员受益,并以此提升工作满意度。此外,家政服务人员对于社会歧视的感知也对工作满意度具有

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受到社会歧视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较低。这说明,从社会整体上提高对家政服务人员工作的认可度,尊重家政劳动,承认家政服务人员劳动的价值,对于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家政服务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郊广场舞与上海工人新村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杨君副教授通过讲述上海城郊广场舞的个案,分析了国家是如何与这类社会群体产生关联并维持这类群体可持续发展的。杨教授的个案研究发现,广场舞除了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有其独特性外,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中也可能含有某种普遍性。广场舞作为一种大规模自发形成的具有公共属性的民间群体,可视作为基层自治性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既有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补充。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刘希副教授从纪实与研究、虚构与非虚构的视角梳理了2013年以来关于上海工人新村书写的作品。根据刘希副教授的研究,罗岗、付晨和丁桂君几位文化研究和建筑学学者探讨了上海工人新村的住宅类型和历史文化价值。杨辰2019年出版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以上海普陀区的曹杨新村为例,探讨了其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2022年初,由上海和苏州三所高校的女性学者共同编著了《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她们发现在剧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多重压力,如亲密关系、家庭沟通、再生产劳动负担等困境,但是新村保留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和社会动员员对她们面对社会转型乃至抵抗疫情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刘希副教授分析,关于上海工人新村的各种非虚构和虚构书写,如金宇澄的《繁花》、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张怡微的《旧时迷宫》等也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空间变迁中的家庭和个体的复杂的记忆记忆和情感结构。这些作品在为共和国史中这段特别的空间实践和日常生活作传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回望历史的多棱镜。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叶子婷分享了“海上凡花”的研究方法。叶子婷的研究团队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对工人新村的20位基层女性进行了采访,并对其中13位女性进行了口述访谈。通过口述的方式,记下了她们从新中国崛起,到上海成为我国国际大都会进程中的人生历史。在2020年暑假期间,研究团队还邀请了几位基层妇女参加了为期四周的日记写作工作坊。这四周的妇女日常生活日记,呈现着疫情期间女性视角中的家庭关系、邻里互助、居委会动员员的能力,以及城市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研究团队以“海上凡花”为命题,希望借机把这些女性习以为常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这些她们觉得平凡、琐碎甚至不值一提的生活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困境中妇女的勇敢、坚韧和乐观。

· 编者按 ·

近年来,家庭矛盾问题增多且日益复杂化,部分地区的家庭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60%以上,一些家庭矛盾“民转刑”甚至引发恶性案件。鉴于此,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于2020年推行“家和智联”,继承了中国治理文化中家户制这一本源传统,并创造性地进行了现代性转化。经过两年的实践,“家和智联”逐渐引起关注。本文基于富阳探索,分析了“家和智联”的创新价值及局限,并就家事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 贺华丽 卢福营

近年来,家庭矛盾问题增多且日益复杂化,部分地区的家庭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60%以上,一些家庭矛盾“民转刑”甚至引发恶性案件。鉴于此,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于2020年推行“家和智联”,实施家事服务创新。本文基于富阳探索,分析了“家和智联”的创新价值及局限,并就家事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家和智联”的创新价值

首先,体现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性的创新。

强调“联动”功能,构建党建引领的多元协同服务体系。“家和智联”的重点在“联动”。由政法委、妇联牵头,调动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实施家庭矛盾化解和困难扶助,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联动服务格局。打破了分工分立、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管理服务,实质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多元共治的实现形式。

重视“数智”价值,探索数智化家事服务模式。“家和智联”关键在“数智”。自觉运用数智技术赋能家事服务,建立了全域家庭数据库,研发了“家和智联”数智平台和“家和智联”管理机制。依托数智平台,建立上报日志、反馈机制、考评机制、留痕机制,实现家事服务可视化、流程化管理。

其次,体现富阳区家事服务特殊性的创新。

突出“家庭”地位,创新以家庭为单元的基层治理方式。“家和智联”的核心在“家庭”。突出家庭单元。将基层治理单元从村委会、网格等下沉到家庭,突出家庭这一具体治理场域。摸清家庭底数。以共同居住为标准,摸清全域“家庭”底数。截至2022年11月,共摸排家庭数282391户。重在家事服务。将家庭矛盾纠纷问题分为情感、经济、邻里等七类,针对性开展服务。截至2022年11月,一线采集家事信息累计20893条,公安等8个部门推送家事纠纷信息35357条。意在家庭和睦。“家和智联”的目的在于以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据调查分析,2022年11月全区“家和率”达97.18%。可以说,“家和智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重新“找回”了家庭,拓展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

选择“主动”方式,尝试家事服务新形式。“家和智联”的亮点在“主动”。改变“坐等上门”等“被动”服务,主动地去发现家庭矛盾问题,主动地“治已病、防未病、控复病”。主动服务不仅是服务方式的转变,而且转换了基层工作理念,锻炼了服务者能力,密切了干群关系。

追求“精准”目标,促进家事服务精准化。“家和智联”的要点在“精准”。建立守法、平安、和谐三类指数



和相应标准给每个家庭赋分赋码,精准定位和动态调整家事等级和家庭码。90分以上为绿码,60分—90分为黄码,60分以下为红码。不同家事等级家庭实行差异化管理服务,特别是对红、黄码家庭采取“一户一策”、分类分级的精准服务。

“家和智联”家事服务创新的局限

“家和智联”是一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正处于探索和尝试过程中。理性分析,这项创新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创新认知与定位的局限。家事认定标准不明确。哪些家事会影响家庭和谐?影响程度如何?管理服务聚焦于业已影响家庭和谐的家事抑或可能影响家庭和谐的家事?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标准。

家事管理权的疑虑。家事是否完全属于私事?公权力可否介入家事?党政开展家事管理服务是否越权、越位?对这些问题的犹豫和顾虑,致使“家和智联”平台在相对隐秘的状态下运行,数智共享功能受到限制。

主动服务的片面。家庭矛盾问题复杂且具有隐私性。通过上门走访等方式主动采集信息并积极应对,难以完全、及时、精准地发现和解决矛盾问题,影响了真实需求的了解。

其次,家事服务体系的局限。服务主体结构不合理。“家和智联”构建的区—乡镇(街道)—村纵向体系源自传统的科层制结构,习惯于通过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层层下达的方式推动家事服务。容易形成形式主义、痕迹主义等问题,影响治理有效性。

服务资源和方式单一。“家和智联”服务资源基本依赖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全县只链接了“百姓幸福家庭服务中心”一家社会组织,家庭自治资源没有充分激活。服务方式以矛盾调解和困难帮扶为主,道德、情感、法治等服务手段应用较少。

服务对象受限。“家和智联”开展的家事服务,受益面有限,家庭数据库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利用。

最后,家事服务能力的局限。公共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如网格员、妇联主席显现出多方面的能力挑战。有些表示信息的据实采集非常不容易,有些对“家和智联”中异常家事的清晰描述存在困难,有些则缺乏与异常家庭开展沟通的能力。

专业服务能力相对缺乏。“现在‘家和智联’把家事集聚起来了,但怎么把这些问题解开,缺乏配套资源。我也想帮助这些家庭,但富阳区哪些专业资源可以给我们使用?”显然,家事专业组织和人才资源的短缺,限制了“家和智联”治理效能最大化。

自我服务能力相对不足。“家和智联”在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家事提供服务的同时,未能充分认识到家事服务过程中家庭成员的力量,家庭自我服务能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

促进“家和智联”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家和智联”继承了中国治理文化中家户制这一本源传统,并创造性地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当前针对以上局限,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首先,合理定位家事服务。合理定位家事服务中的家庭。明确家庭在家事服务中具有基础地位。家事服务中家庭应当扮演好内部整合和自我服务的角色。明确家庭是可以适度介入的对象。公权力和社会力量有必要适当介入家庭和家事,但应当有边界。

科学选择家事服务的方式。将主动服务与被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既做好“我要服务”,又加强“要我服务”。积极探索不同情况下有效的方式,因事制宜,实现家事服务的绩效最优。

其次,建构家事服务“四四”体系。党、政府、家庭、社会“四方联动”,建构党领导的多元共治体系。特别需要更好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

德治、法治、智治、情治“四治融合”,建构多种方式并重的服务模式。既要根据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普遍性,强调德治、法治、智治;又要根据家事的特殊性,突出“情治”的功能和价值。

国家资源、集体资源、社会资源、家庭资源“四资共用”,建构多种资源共用的资源调动与传输方式。生产性家事与生活性家事、问题型家事与需求型家事“四事统一”,建构多种事务相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场景和服务机制。

最后,提升家事服务能力。提高家庭自我服务能力。借助有效的家风建设和家庭教育,养育良好家风,增强家庭内部整合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不断提高家庭成员的数智素养、心理素养、沟通能力等,增强家庭自身的家事服务能力。

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服务能力。加强家事服务队伍建设。配足配齐家事服务人员,建构一支数量充足、素养适合的家事服务专门队伍;加强家事专业服务能力。有计划地培育和引进一批家事专业性社会组织和服务人才,积极链接各类媒体、高校等专业资源,赋能家事服务;加强家事服务数智赋能。不断完善家事服务数智系统,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让家庭数据充分运转起来,充分发掘平台系统的增值效应。

(贺华丽为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卢福营为杭州师范大学家庭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视窗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作者:杨菊华

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华民族人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控制性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人口都先后经历了生育转变。本文作者利用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两个指标,关照生育转变的起点、过程与结果,通过对普查数据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作为一总体,其生育转变的起点约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略晚于全国的生育转变;尽管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其生育转变的完成时间约晚于全国10年,但2000年前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已经完成了生育转变。第二,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具有“超前”和“滞后”双重特征,西部民族“滞后”,东北民族“超前”。第三,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符合经典的生育转变理论预期,但不同民族的生育转变同样深受生育政策、文化制度的影响;现代化进程和“优生优育”“少生优生”政策宣传的共同作用,弱化了传统的民族生育文化效应,推动了各民族的生育行为在变异中趋同、在多样中趋近。通过采取“观起点、看过程、比结果”的研究思路,清晰地界定生育转变概念,本研究弥补了既往研究多笼而统之的描述(不同)民族生育水平的局限,可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生育转变研究形成对话,有助于丰富中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宝库。

来源:《人口与经济》

《新时代打拐行动中的警务合成作战指挥研究》

作者:张容琦 刘志勇 杜德炜 张杰强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公安机关对该类犯罪始终实施高压态势的打击。本文作者认为,新时代拐卖人口犯罪具有低发、隐蔽、利益链、技术链、方法链复杂等基本特征,常规方法难以从源头上杜绝,警务合成作战模式应用于打拐行动中,拓展了情报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指挥信息,健全了指挥机制,提升了打击合力,打通了部门壁垒,实现精准指挥处置,加强了快反能力,增强指挥执行效果,为高效打拐,维护人民利益,构建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了有益尝试。

来源:《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白晨 整理)

《产业结构升级、教育提升与中国城镇女性就业》

作者:马光明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可能对女性就业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基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产业结构与女性就业三者关联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第二产业内部代表低端制造业的加工贸易比重越高,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越难以促进女性就业;高端服务业越发达,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越能促进女性就业。稳健性与异质性检验显示,教育促进城镇女性就业的效果受到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状况的制约,当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教育促进城镇女性就业的效果就会显著增强,且女性受教育层次越高,刺激效果就越强。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